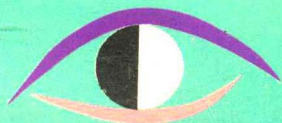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 汪熙 主编

巨大的转变： 美国与东亚 (1931-1949)

〔美〕入江昭 孔华润 编



中、美、日三国历史学者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主持下，围绕着二次大战的火星为什么首先在东亚爆发，东亚的局部冲突为何会导致世界战争等问题，进行了数年探讨。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

(1931—1949)

〔美〕 入江昭 编
孔华润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锡鏖 邬红伟

责任校对 马金宝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7辑)

汪 熙 主编

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

(1931—1949)

[美] 人江昭 孔华润 编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579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35 000

版 次 1991年5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7-309-01922-9/K·63

定 价 1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明目张胆地侵吞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又公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直至自取灭亡;美国则从奉行名义上的不干涉主义开始,最后引火烧身,被迫参战;而中国则在被侵害、被蹂躏的困境中,始终坚持抗战,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中、美、日三国历史学者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主持下,围绕着这次大战的火星为什么首先在东亚爆发,东亚的局部冲突为何会导致世界战争,这场人类浩劫能否避免等问题,进行了数年探讨。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上述问题。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合作研究历史的做法无疑会促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Publication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ries Editor: Wang X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1931—1949)

Edited by Akira Iriye
Warren I. Cohen

Fudan University Press

主 编 前 言

20 世纪的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世界上多事的年代。30 年代初,日本明目张胆地侵吞了中国的东北地区;随后,又试图一举侵占东北平原。1937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国大陆。两年以后,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帷幕拉开;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使整个太平洋地区几乎没有一片宁静的土地。一场史无前例的真正的世界大战载入了人类史册。为什么这些不幸的年代都交汇在这一历史交叉点上?为什么战火常常首先在东亚爆发?这场人类浩劫可以避免吗?这种从局部冲突发展为世界性的战争可以推迟吗?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它的东亚政策是否明智,其成功、失误或错误之处在哪里?人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回顾与反思的重任落到了历史学家身上。

在入江昭教授组织下,美、中、日三国的历史学家经过几年研讨,形成了这本论文集,试图回答我们在上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美、中、日三国学者会聚在一起,以不同国家的背景为基础,共同讨论它们都曾一度深深卷入的历史,这还是首次。尽管历史学家们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运用了丰富的学术知识,对这一段历史作出了各自最佳的论述和分析,但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共同之处,也有分歧之点。这正是这本书的特点,也是它的可贵之处。

入江昭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特别致力于东亚关系史的研究,曾两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是 1988 年度美国

全美历史学会的会长，现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组织这样规模的学术讨论是一项很艰巨的学术工程，感谢入江昭教授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日、中学者的通力合作以及翻译者的辛勤劳动，终于使这本论文集的中译本得以问世。鲁斯基金的慷慨资助，使这一项目能够贯彻始终。我们表示感谢。

本书将在中、日、美三国以各自的语言同时出版发行。书中各篇论文的观点只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不代表出版社、美国研究中心或主编的观点。

多国学者聚议一堂，可以扩大视野与思路，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我们期望有更多这一类的学术交流活动。

汪 熙

1989年7月于复旦校园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美国学术资源出版公司(Scholarly Resources Inc.)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的中文版。书中包括十篇由历史学家们所撰写的论文,其中两篇是中国学者写的,两篇是日本学者写的,五篇是美国学者写的,还有一篇是我本人的文章。因而,本书可以说是三国学者同心协力的成果。

编纂这本著作的想法在七年以前就产生了。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获得了鲁斯基金会的一笔资助,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研讨班,广泛、深入地研究从1931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的美、中、日三边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多事的年代。我们觉得,有中国和日本学者参加是十分重要和非常有益的。我们很幸运地请到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四位著名历史学家到美国参加这个研讨班。十位学者在一起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每位学者通过论文交换了各自的意见。

本书中十位学者的论文,都经过了修改。尽管我们的讨论会是几年前举行的,但是这些论文仍然具有新鲜感。它仍然能够反映我们在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和严肃的讨论中所产生的那种兴奋感。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生动的讨论。尽管我们彼此的思想观念和国家背景不同,我们还是十分愿意相互交流看法。通过交流,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和繁荣。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获得了成功。本书中的十篇论文无论在史实或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都取得了某些新的成就。然而,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他们共同拓展了认识那些多事年代视野。

今天,美—中—日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之间的不受教条主义和政治干扰的学术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那个战争年代的重要教训,也是我们对过去重加探索时的指导原则。

我十分感激复旦大学出版社承担本书的出版工作,感谢汪熙教授在项目进行期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本书的中文翻译者。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的作者如此耐心地等待本书的出版。

入江昭

1987年7月

(陈锡鏢 译)

序 言

本书是国际合作编纂历史的一些尝试。书中包括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的论文。它们集中讨论了1931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的历史。作者都是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专家，都发表过关于这个时期美国—亚洲关系的著作和论文。他们对探讨历史，以及向美、中、日三国读者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读者传达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怀有共同的兴趣。1931年到1949年这个时期对于他们承担这项任务似乎特别合适，因为这是一个冲突、战争、革命和内战的时期；而且，来自这些国家的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个多事年代的学者尤其有能力来比较和甄别有关的研究成果，并对历史现象进行反思。

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六位美国历史学者、两位中国的和两位日本的历史学者得到了亨利·鲁斯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使他们能够在1982年至1985年定期会面。在这三年中，美国的参加者经常碰头，而来自两个亚洲国家的参加者访问了美国，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以出席小组会议，并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所有十篇论文都在小组会议上逐一宣读和讨论；在收集出版之前，又经过了几次修改。参加者并非总是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見，他们对这段历史解释的重大分歧仍然保留在他们的论文中间。本该如此，我们并不力求对过去的事情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而是通过共同研究各种有关的问题，比较各种观念和方法，谋求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事件——其中大多数是不幸的事件。而且，我们始终坚持我们的目标，为不同国家的读者提供美、中、日三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思想，达到进

一步促进国际间学术交流的目的。

书中的四篇文章论述了从九·一八事变(1931年)到欧洲战争爆发(1939年)的30年代的美-亚关系。其间,日本侵占了东北、华北,最终侵略了整个中国。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实际上首当其冲地单独受着日本的侵略,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任何实质性援助,也没有得到美国的任何帮助。美国是否可以作出某种行动,以影响这些事件的发展呢?这个问题经历了长期争论。孔华润和汪熙直接讨论了这个问题。孔教授认为美国应该听从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的告诫,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仅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秩序。孔教授对史汀生的看法与众不同。史汀生常被描述成为教条主义的捍卫者和干涉主义者,他在美国利益没有直接卷入的情况下,不惜冒同日本交战的危险,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而孔教授把史汀生看成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知道太平洋两岸的对峙迟早会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并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同意他的看法。孔教授指出,罗斯福的海军扩展计划很明显就是为了同日本保持平衡而制定的。史汀生-罗斯福方式最终导致了集体安全体系的出现。这一想法在1937年罗斯福的“免疫讲话”中已经有了表述,那年年底,“班乃号”轮在南京沉没后,加速了其准备工作。到1938年,罗斯福总统已经决定采取除了战争之外的一切措施,使美国再次卷入国际事务之中去。孔教授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是新方式的“最先得益者”。

汪熙不同意孔教授对罗斯福的看法,尤其是对30年代中期罗斯福的表现感到失望。汪教授的论文集中论述了1934年白银购买法案,他认为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困境漠不关心的一个例子。他论述到,美国应该、而且能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而美国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它只考虑其国内利益,尤其是只考虑追逐利润而不顾白银购买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罗斯福逆来顺受地接受了

白银政策，这种做法比对中国索性无所作为的危害还要大。汪教授认为，如果美国在这一方面不采取任何动作，就不会人为地引起白银价格的上涨，这样，中国抵抗日本的有效能力也许不会被削弱。亚洲的权力平衡也许能够维持下去。这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得益远远超过了白银购买政策为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带来的暂时的好处。在这一点上，就像孔教授的论文中描述的那样，美国面临着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孔教授着重点是维持国际秩序，而汪教授的分析则注重区域间的权力平衡。然而，两位作者一致同意，若能早一点帮助中国加强抵抗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细谷千博和白井胜美的两篇论文揭示了日本在30年代也有一种选择。就像细谷教授指出的那样，当1933年罗斯福成为总统之时，日本政府对探索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很有兴趣。日本自侵略东北后，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受到孤立。东京渴望获得华盛顿的某种谅解，重建亚洲秩序。然而，在这里细谷同意汪熙的观点，30年代中期美国的政策是考虑美国国内利益的产物，而不是长期的深谋熟虑的产物。因而，他们对日本的表示没有系统的反应，也没有援助中国的全面规划。1933—1934年的棉花和小麦贷款，使美国摆脱5,000万美元剩余产品的这笔交易，使美国同日本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更加无望。然而，这个计划并不比白银购买法案对中国有更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逐步深入。细谷写道，即便如此，一些日本官员对日本在中国的单独扩张感到不快，继续谋求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和英国合作。白井教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论点。他把佐藤尚武的国际主义和近卫文麿的反国际主义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前者坚持日本的基本需要是经济上的，因此，它的出路只在于同西方国家合作，恢复开放的和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秩序。

作为一位职业外交家，佐藤在1937年担任外相后，有机会试验一下他的设想。但是，他的在职期间实在太短了。他的观点无论

如何也不能被东京的大多数文官所接受，更不谈为军界人物所接受了。他们旨在声称日本的特点是一无所有。按照他们的观点，作为一个空间和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日本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向其邻国扩张和开发，即使这样做必然会排斥西方利益，也该如此。同自然资源丰富的西方国家合作是没有意思的，除非他们愿意同日本共享其空间和财富。近卫及其同事坚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上述四篇论文揭示了美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中美合作反对日本；美日在中国合作；日本独霸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或者是某种包括三和欧洲列强的的国际共管，以维持表面上的区域秩序。然而，第三种方式，即日本控制中国，美国不进行实质性的干预，是1931年到1939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这些论文还揭示了一些幕后的更为复杂的动向。这都表明需要更多的有关中国想法和政策的资料。汪熙的论文主要依赖于美国和日本的资料即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档案需要进一步开放，对中国政策的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另一方面，高家龙的文章显示了富有想象力地使用少数可供使用的资料，也能对30年代的中国政治作出深刻分析。高家龙集中论述了政府-企业关系，指出了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家族——荣氏家族，是反对日本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此，汪熙教授或许不能同意——但高家龙争辩道，这与其说是抽象的民族主义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对保护家族利益的关心。所以，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荣氏家族拒绝迁往内地的命令，继续留在上海，并在战争期间兴旺一时。这种“企业重于政治”并不一定是典型的，但这里提供的证据却是无可挑剔的并对中国民族主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种简单的描述进行了矫正。与此同时，高家龙对南满铁路的论述中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的激烈的利益冲突和观点分歧。在控制华北的经济政策中，该铁路由最初抵抗军人控制到最终向军人投降，这个过程

用单一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容易使人误解。这正如美孚石油公司在消除华南炼油企业的中国竞争中,成功地谋取了华盛顿的支持一样。高家龙文章末尾所描述的这一过程,使得美国卷入(或没卷入)中国事务的图像更加复杂了。

高家龙在其文章中确实也指出了 30 年代后期美-亚关系的主要变化。当中国政府机构作许多企业迁往内地之后,日本军队控制了占领区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更多地卷入了保护在美国的利益免受日本侵略的事务之中。这个阶段被看作是日本同美国的对峙阶段,美国开始日益增加对中国的支持。

瓦尔多·海因里希论述了罗斯福总统拒绝“同日本携手合作,在中国追求和平并解决问题的机会”。这种政策或许能使美国集中精力,对付欧洲 1939 年战争爆发后的局势。海因里希认为,罗斯福拒绝接受那种战略,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平洋局势同大西洋局势在发展中的连锁关系。1941 年以后,这种联系变得更加明显了。海因里希表明,当该年 4 月美国海军冒着同德国交战的危险在大西洋巡逻时,出于慎重,美国表示了某种愿意同日本人谈判的姿态。但在 6 月 22 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之后,任何同日本的妥协都会被看作鼓励日本从后方攻击苏联,其结果不仅对苏联来说是灾难性的,对英国和美国也是灾难性的。海因里希指出,由于这种原因,罗斯福对日本的立场变得十分强硬了。他首先考虑的是让苏联抵抗住德国的进攻,他试图以把日本军队拖在中国和事实上的石油禁运来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顾后一项措施可能引起日本的南进。罗斯福宁愿看到日军南进,也不愿日军北进。这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能够使得我们将苏联、大西洋、中国和太平洋局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东南亚在加里·赫斯的观点里有了新的意义。赫斯教授将美-亚关系放置到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的大构架中来具体论述。他指出,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在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卷入

越来越深，更不提它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了。赫斯认为，到1940年美国已是这个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而日本向南扩张却对此形成威胁。1941年美国同东印度地区的贸易已经超过了日本，华盛顿甚至考虑向泰国提供军事援助，抵抗日本可能的进攻，尽管最后没那么做。正如太平洋战争使得日本军队进入了这个地区，它同样也使得美国在亚洲这个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扩大和加强。赫斯追述了战时美国制订的有关东南亚前途的计划，尽管由于战后新的反共产主义战略使这项计划有了某些修改。有趣的是，在菲律宾和泰国，美国同那里的精英们紧密合作，甚至包括那些同日本合作过的人，但对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美国对英国和荷兰分别施加影响，准许它们独立。相反，在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倾向支持法国的立场，这使得美国在早期就同那里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形成对立。虽然，美国对于东南亚各国的解决方法各不相同，但是，这场战争却使得美国作为列强出现在东南亚地区。

同美国势力在亚洲扩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灾难。日本在1941年发现自己被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包围”了。按照日本的观点，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从这种状况下解脱出来的孤注一掷的挣扎，这场战争导致了以后数年中日本在陆地上的扩张，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彻底失败了。入江昭的论文概述了这一过程。入江昭又回到了细谷千博如白井胜美的论文所讨论的题目，他认为“包围”并非是唯一的发展方向。如果日本设法在30年代末回到“华盛顿会议体系”，同美国和英国合作，某种区域秩序或许能够得到恢复。日本由此得到的它所期望的经济利益比选择军事方法所能得到的更多。入江昭提出，除了在战争中出现的华盛顿体系之外，还有其他的国际体系，如由美、英、苏、中紧密合作的想法——开罗会议的方式——或美苏协约——雅尔塔会议方式。人们同时探索着这几种可能性，但至少对日本来说，美国的“复兴”战略意味着回到多边贸易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想法中去，这种政治

合作为华盛顿会议体系提供了基础。

然而,那种体系应该不是强权政治的概念,而是建筑在列强们自愿进行裁军的基础之上。但是1945年以后,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而苏联将其势力伸展到其邻近国家,强权政治从未消失过。事实上,它还支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点上,罗伯特·麦瑟论述了从罗斯福的“在战后亚洲从复兴、同化的方式对付苏联”到哈利·S·杜鲁门总统的“反苏、反共和遏制为特征的竞争与好斗主义”的转变。杜鲁门为何抛弃前任总统的雅尔塔构架,而代之以遏制的冷战政策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题目。麦瑟通过考证某些新的证据,阐明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杜鲁门对日益明显的美苏竞争十分警觉,并决心阻止苏联势力在亚洲的扩张。同样的权力竞争感引诱他在日本投降后立刻派军队到朝鲜和中国去。这些步骤不是“雅尔塔会议的结果”而是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虽然,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主要集中在欧洲,但杜鲁门企图保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并且“重新使”中国和朝鲜成为反苏势力的桥头堡。

这种看法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却是权力政治思想的必然结果。权力意味着统治,无论对日本、苏联或美国都是一样。罗荣渠教授在观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时,以“东亚的国际权力结构”的方法,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美-亚关系。他认为,在30年代,美国在其“政治战略”中,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其次才是中国。由于美国不能也不愿单方面地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它首先寻求同日本达成谅解,谋求保持某种平衡。这种企图失败后,美国才转向中国,反击日本的扩张。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把维持中国抗战看作是头等重要的。然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不愿执行这项任务,因为他们在准备同共产党最后摊牌。由于美国的“越岛战役”降低了中国在同日本作战中的重要性,战争将近结束时,苏联势力的增长使美国感到必须将一个统一的中国带入“美国控制的世界轨道之内”。虽然,美国没有始终如一地执行这项政策,因为它优先考虑的

是在欧洲同苏联的权力之争,但是,1950年美国对朝鲜的干涉意味着美国在采取最后步骤争夺这个地方的“世界霸权”。这同战后世界的“各民族和国家的合法愿望”格格不入,因而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种重要流派。它给人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印象,实际上,罗教授的说法同赫斯、麦瑟及其他作者的观点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总之,这十篇论文广泛地概括和提示了30年代至40年代美-亚关系动荡历史时期中的具体课题。在这个时期中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和灭亡、中国的革命和内战、西方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和美、苏势力的扩张。这些论文从三国各自的观点来研究这些发展进程,反映了当今的学术发展趋势,证实了国际间合作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编者和作者希望本书的出版将会促进类似的合作,以加强世界范围的学术交流。

编者衷心感谢亨利·鲁斯基金会对本项目提供的资助,并真诚地感谢九位同事为本书所作出的共同努力。1982年至1985年,当项目参加者定期在芝加哥大学开会之时,他们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助理秘书阿列克塞·罕德的热情款待。朱昌峻教授出席了几次会议,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本书稿件的定稿得到了孔华润和雷尼·弗德逊的帮助。

入江昭
(陈锡鏢 译)